

B 白城记忆

明朝中期进入白城及周边地区的蒙古科尔沁部

●宋德辉



明代青花双凤纹瓷盘

明代青花瓷碗

明代万历铜钱

明朝时期是指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元大都，推翻元朝，建立明朝至清朝前期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元顺帝受欢帖木儿撤出元大都，退回漠北，与明朝形成南北对峙时期，这一时期也称为北元时期。

北元时期是哈萨尔家族后裔支系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哈萨尔家族的所属部落形成了蒙古史上重要的两大支系——科尔沁部与和硕特部，并由此逐渐衍出为数众多的部落。以哈萨尔后裔为领主的这两大部落集团，分布于蒙古地区的东西两端，对整个蒙古史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在捕鱼儿海大战中，北元第三任大汗脱古思帖木儿被明将蓝玉击溃，由大汗直接指挥的军队和物质几乎丧失殆尽，在逃往漠北哈拉和林途中被部下所害，致使北元政权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随着蒙古大汗权势的衰落，位于漠北东部以哈萨尔的封地及后裔为统治核心的科尔沁部趁机崛起，成为蒙古地区实力最强的政治、军事集团之一。从14世纪到15世纪初，科尔沁便成为哈萨尔后王家族所属部落的泛称——科尔沁部。

自元顺帝受欢帖木儿退出元大都，到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这一百年的时间中，蒙古高原充满了各部封建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在这纷繁复杂的权力争夺过程中，哈萨尔后王家族始终忠于“大元后裔”蒙古大汗，其自身发展与演变也与之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可分以下三个阶段来概括科尔沁部的发展演变过程。

第一阶段，从元顺帝退出大都到瓦剌部蒙古首领也先统一蒙古(1368年—1453年)这一时期，哈萨尔后裔代表东蒙古正统汗系的利益，与明朝军队和西蒙古封建主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从1379年起，北元政治中心逐渐转移至哈萨尔后王领地呼伦贝尔一带，使该地区一度成为蒙古王正统汗系所在地，相应地也成为明朝与蒙古地区另一政治、军事集团瓦剌蒙古斗争的焦点。1410年，封建主马哈木弑杀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拥立其子答里巴为蒙古大汗，并利用此次树立北元正统汗系的有利时机，大有欲称霸蒙古之势，为阻止瓦剌封建主控制整个蒙古，北元权臣阿鲁台与科尔沁哈萨尔后王家族结成联盟，以“元氏子孙已绝”为由，拥立哈萨尔八世孙阿鲁帖木儿为北元第十一世可汗，号称“阿岱汗”。在阿岱汗的统领下，东蒙古不仅吞并了明初设置的兀良哈三卫，还将势力扩展到洮儿河流域。不仅如此，而且还率领东蒙古西征瓦剌部，同其争夺对整个蒙古地区统治权。1438年，阿岱汗在同瓦剌蒙古脱欢太师的战争中败亡，科尔沁部受到重创，绝大部分部众被迫加入早期瓦剌联盟。哈萨尔后王科尔沁部的发展进入低迷时期。

第二阶段，达延汗统一蒙古(东蒙古)前后时期(1454年—1517年)这一时期是科尔沁部辅佐蒙古正统汗系重振蒙古汗权的时候，也是科尔沁部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1454年，瓦剌在东蒙古的统治土崩瓦解，科尔沁部也乘机摆脱了瓦剌蒙古的控制。之后，在蒙古各部封建主争权夺利的过程中，科尔沁部哈萨尔后裔始终站在蒙古正统汗系一边。哈萨尔第十一世孙孛鲁乃齐王和孛罗特诺颜兄弟二人，为报杀害岱总汗、马可古儿思汗、摩伦汗之仇，他们相继讨伐了郭尔罗斯部的彻卜登、多罗土默特部的多郭朗台吉、翁牛特部的毛里海王等，协助满都海汗取消了太师的特权。接着，在达延汗统一蒙古的过程中，哈萨尔后裔们又协助其征服了强大的兀良哈部，并在平定右翼三万户叛乱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达延汗统一蒙古铺平了道路。也正因为科尔沁部的拥戴之功，达延汗统一蒙古之后，没有将其纳入大汗直接统辖的六万户范围内，而是允许其独立自成立一个万户，在蒙古诸部中享有特殊地位。科尔沁部在这一时期势力发展很快，其下属分为左翼七鄂托克(部落或屯营地)和右翼六鄂托克，分别由孛罗乃齐王和孛罗特诺颜兄弟统辖。其领地以呼伦贝尔为中心，不仅囊括了兴安岭以南嫩江流域，而且还统辖鄂嫩河流域。同时，科尔沁部的人口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据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记载，达延汗时期科尔沁部人口已达到二十万。

第三阶段，从达延汗去世以后到明末，在这段时期，科尔沁部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分衍成众多部落。

16世纪初，随着达延汗的去世，蒙古大汗的权威再次衰落，导致兀良哈部在漠北地区发动叛乱。受此影响，科尔沁左右两翼鄂托克也各自沿着不同的发展方向而形成了众多分散的部落。孛罗特诺颜所统辖的右翼六鄂托克人一直留牧于鄂嫩河上游一带，而其兄孛罗乃齐王所属的左翼七鄂托克则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孛罗乃齐王一系主要分化为三支：一支由孛罗乃长子鄂尔多固海统领，留牧于鄂嫩河下游尼布楚一带，属下分成茂明安、新明安塔奔两部。一支以孛罗乃次子图美尼雅哈齐之长子奎蒙克塔斯哈喇为首，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开始，陆续迁移到嫩江流域，这部分科尔沁人也因此被称为“嫩科尔沁”。而留居于原地的一部分，即阿鲁科尔沁、四子部、乌拉特部等，统称为“阿鲁科尔沁”，意为“留在后边的科尔沁”。嫩科尔沁进入嫩江流域后，逐渐向南、向东扩展，先后占领了绰尔河、洮儿

河、霍林河、西拉木伦河及松花江这片广大地区，并征服了早在金朝晚期从呼伦贝尔地区迁至嫩江、松花江流域的蒙古豁罗刺思部，即郭尔罗斯等部。奎蒙克塔斯哈喇诸孙乌巴什、爱纳噶、阿敏等人分别统辖嫩江流域的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部。这些部落虽然很早就存在，但他们真正被载入史册却是在被科尔沁部哈萨尔后裔统领之后。按照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通例，一个氏族被他族或他部征服、吞并或融合之后，往往自动或被迫舍弃自己原来的族名或部名而改用征服者、吞并者或融合者的族名或地名。因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部均属蒙古族部，虽然保留了部落的名称，但统称为科尔沁部，并成为科尔沁部的组成部分。

另一支则由图美尼雅哈齐次子巴裘诺颜长子昆都伦岱青统领，部号为“阿鲁科尔沁部”。次子诺泰将名下部属分给了自己的四个儿子，因而被称为“四子部落”。博尔海鄂特所属部被称之为“乌喇特部”。

西迁的科尔沁部在明朝末期基本定居于青藏地区，形成了青海和硕特部和内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

游牧于白城及周边的嫩科尔沁部在明末清初，形成了科尔沁左翼、左、中、右三旗。科尔沁右翼、左、中、右三旗和郭尔罗斯前、后两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等共10旗，并以10旗为基础形成了哲里木盟。早期会盟地在今天的内蒙古科右中旗吐列毛杜镇西北3里处，至今还保留着会盟地遗址。

今天白城市所属的通榆县一部分、洮南市、洮北区属于清朝初期清政府所划定的科尔沁右翼前旗，通榆县原瞻榆县部分属科尔沁右翼中旗，镇赉县和大安市原安广县部分属科尔沁右翼后旗，大安市和原赉县部分属扎赉特旗。

(二十八)

“为官之道，道在亲民；为官之要，要在为民；为官之责，责在利民。”这，于古于今都是至理。

《明史》记载，明代大臣何文渊任温州知府六载，“察民情、革奸弊”，给当地带来了“家给人足，讼简风淳”的和兴局面。当他调任离开温州时，“老稚遮道挽留”，何文渊有感于此情此景，赋诗作别：“行囊不载温州物，惟有民情满腹中。”

一句“惟有民情满腹中”，道出了一名地方官员亲民的心声。古往今来，亲民始终被清官廉吏视为为政之要。清代谢金奎在《居官致用》中指出：“州县乃亲民之官，为之者别无要妙，只一‘亲’字认得透，做得透，则万事沛然，无所室碍矣。”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踏踏实实做“亲民”上用力，造福一方百姓，才能赢得民心。

何为亲民？清代汪辉祖认为：“亲民之吏，分当与民一体。”他在《学治臆说》中也有一番关于基层治理的论述：“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民以诚，示民以信，不觉官之可畏，而觉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体之象也！”由此观之，“亲民”不是肤浅的作秀，而是要做到“与民一体”，将百姓所盼所托作为头等大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思为民之措、多行为民之举。

北宋王安石曾担任鄞县知县，在短短3年任期内，满怀济民之志，躬身践行亲民之道。据《鄞县经游记》一书记载，王安石上任就开始实地考察兴修水利的情况，用十余天时间在基层走访，“凡东西四十乡，乡之民毕已受事”，才打道回府。走访期间，王安石为了不扰民，夜晚都宿于寺庙。实地考察后，王安石随即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定治水规划，并带领民众疏浚川渠，从治水入手为鄞县人民解除困扰多年的旱灾之苦，此后更是在任上推行了平抑物价、创建县学等诸多利民之举。王安石亲民，鄞县人民对其亦是念念不忘，时至今日，当地仍留有实圣庙、荆国公祠等多处缅怀他的遗迹。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像何文渊、王安石等人，为官一任带走的不是金银细软，惟有“满腹民情”。“政声人去后”，他们亲民爱民的的事迹在百姓心中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留下世人敬仰的丰碑。

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心里只惦记着一己私利，一门心思钻研如何搞好“自我包装”，有的将基层工作当做“面子”工程来经营，集中资源“造盆景”，只为应付上级检查；有的对待民生工作，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推诿扯皮“要滑头”；有的在扶贫工作中“人到心不到”，搞“走读式”“挂名式”帮扶，甚至不曾到贫困村看过一眼、到贫困户家中走上一趟……如此做派，何谈亲民？

“为官之道，道在亲民；为官之要，要在为民；为官之责，责在利民。”这，于古于今都是至理。

诗词鉴赏

送元二使安西

●[唐]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赏析

这首诗又名《渭城曲》，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著名的送别诗。朋友元二即将远赴安西都护府出使，诗人于渭城为他置酒践行，因而作了这首七言绝句。

诗歌前两句写景，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时间当是初春时节的一个清晨，正下着小雨，雨丝绵绵，为送别增添了几分忧伤的氛围。从长安西去的大道上，本来人来人往，尘土飞扬，但今晨因为小雨的滋润，空中的浮尘被洗净，空气明净清新，道路湿润而不泥泞，显得整洁，更利人出行。轻尘，即“行尘”，暗含送别意思。友人居住的驿馆周围，柳叶新萌，颜色青青，因小雨的洗淋，更显得明朗清新。柳，谐音“留”，有留下、

留恋之意，意即希望友人留下。古代送别诗中常有柳的形象，古人亦有折柳送别的习俗。

诗歌前两句渲染离别氛围，撷取的是早春明媚的景象，忧伤却并非黯然销魂的样子。后两句叙事，更有一种慷慨豁达在其中。饯别宴上，觥筹交错，你来我往，当有说不尽的嘱托，诉不尽的情意，行者急于上路，送者再三挽留，送者一句话将宴席的气氛推上了高潮：您再干了这一杯酒吧，往西出了阳关，大漠茫茫，异域他乡，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的面了。诗人只选取送者的这一句劝酒之辞，却表达出诚挚的惜别之情和对朋友的美好祝愿，足见剪裁之妙。

诗歌写出后，因其朴实诚挚，生动明丽，哀伤而不缠绵，传达出依依惜别时共有的情感，被后人谱曲为《阳关三叠》，久久传唱，成为送别诗的经典。

(南果)

成语故事

圆木警枕



圆木警枕：用圆木做枕头，睡着时容易惊醒。形容刻苦自勉。

出自宋代范祖禹《司马温公家范》：“以圆木为警枕，小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

凌珊 郭文瞻/图文

一个民族的初心

●何青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jù)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近代百年，古老的中国走过了一段漫长苦旅。当西方世界的科技与文化漂洋过海而来，我们从不解，转而变为震惊；从震惊，转而变为悲叹。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四书”“五经”与唐诗宋词，在铁路与军舰面前，不过是一堆浮华的修辞。屡屡战败之后，国人一度陷入严重的自卑，觉得中国事事不如人，西方代表着先进文明，中国代表着落后野蛮。正是在这个国家即将在黑暗中沉没的危险时刻，无数的仁人志士开始了艰苦的自救。1894年，当清

政府在侵略面前节节退让之时，一位热血青年在海外成立“兴中会”，号召国人打倒专制，救国图强。为了激励人心，他毅然喊出了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号：“天下为公”。

从此，这四个字如同一道霹雳，划开了中国的长夜。天下，不是一家的财产；人民，不是一人的奴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着幸福的生活。在这四个字的感召下，革命的烈火席卷了华夏大地，腐朽的封建王朝终于被终结了，中国迎来了壮丽的朝霞。

这个青年就是孙中山。他所喊出的这四个字，既不是神秘的咒语，也不是从西方报纸上剪下来的格言。“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礼”，是古代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以及精神信仰。人的活动符合“礼”，就是符合“正义”；因为

有“礼”，一个人才能明白生活的意义与自身的价值。《礼运》篇是《礼记》的重要章节，蕴含着儒家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与文化的理解，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将其视为建立

一个美好国家的重要经验。“大同”与“小康”的概念就出自这一篇章。大同，是最美好的生活蓝图；小康，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说，《礼运》篇，就是中国人的《理想国》。

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的“公”所蕴含的意义可以是国家、社会、大众，也可以是公理、公式、公制；是正直无私的美德，也是公正合理的义务。实际上，这些深远的意义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如同许多的枝叶，一起构成了参天大树。如同孔子对于“天下为公”的深刻阐释：选拔道德高尚的人去做领导，推举有才能的人去做事情。讲求信用，使得人与人之间消除争斗而实现和睦。因此，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这样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呢？很简单，老人得到赡养，青年的才华得以施展，儿童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而健康成长。大家生活在一起，不需要损人利己，而是都努力工作，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分享我们的创造。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渴望，让生活如同万物，自然生长，从丰富富。《共产党宣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叫作“大同”。即便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与屈辱，即便一度陷入迷惘与痛苦，大同的世界，是我们永恒的梦想。这个梦想之所以能够支撑华夏民族穿越重重困境，勇敢追求幸福，是因为“天下为公”的理念，是因为我们不改的初心——让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